

《董必武致宋庆龄函》时间考证

纪亚楠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宋庆龄年谱长编(上)》收录的《董必武致宋庆龄函》，标注其时间为1946年4月12日。信件中所强调的“该省去年蒋军进攻”，以及该地受灾救灾等情况都表明信件的书写时间既可能是1946年也可能是1948年。相比较而言史料记载的1947-1948年的灾荒境况更符合信中内容。而上海市馆藏档案中有关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相关英文档案进一步证实，董必武迫于山东灾情严重于1948年4月12日写了此封信件，加之直到1946年8月13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才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据此可以断定，《董必武致宋庆龄函》的书写时间应是1948年。诚然目前已经很难查到这封求救信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否有安全运送相关物资到山东解放区，但宋庆龄与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山东解放区所做的贡献值得被铭记。

【关键词】信件；董必武；宋庆龄；山东解放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3.996

一、引言

4月12日，董必武向宋庆龄发来一函，报告山东解放区灾情严重，吁请救济。函云：山东省“去年因蒋军进攻，黄河以南地区尽遭兵燹……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受灾严重地区鲁中、鲁南、胶东各有二十余县，渤海区十三个县，滨海区四个县，共计九十县之多，灾民约近二千万……去年，全省麦子仅能种上一半。”“现山东各级政府已尽力所及筹集粮款，急放赈济，并号召地方、部队及政府人员节衣缩食救灾渡[度]荒，普遍组织人民进行生产救灾渡[度]荒运动，只因灾区过广，灾情太重，力未有逮，故特再烦请夫人代向国内外正义之士，呼吁救济。”^[1]这封由《宋庆龄年谱长编(上)》及《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等相关宋庆龄著作收录的《董必武致宋庆龄函》，系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代表山东解总分会给宋庆龄写的一封求助信。《宋庆龄年谱长编(上)》收录的这封信件是根据中国福利会档案刊印，书信结尾的落款是“4月12日”，没有注明年份，但在《宋庆龄年谱长编(上)》及《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等相关宋庆龄论著中却一致认为求助信发出时间为1946年4月12日。根据《董必武致宋庆龄函》的内容，并参考山东解放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相关史料文献，可判断《董必武致宋庆龄函》的发出时间应当是1948年4月12日。

二、信件发出时间或可为1948年

由信中谈到“山东各级政府”可知，信件发出时间应是在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成立之后。假使《董必武致宋庆龄函》发出时间为1946年，那么信中所提及的“去年蒋军进攻”当是1945年，即1945年蒋介石进攻黄河以南地区，导致“人民扶老携幼，东西流亡，以致生产停顿”。然纵观1945年至1948年蒋军进攻路线，史料记载蒋军对于山东地区的进攻分为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两个阶段。1945年在抗战全面胜利前夕，蒋介石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不惜与日、伪同流合污。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在伪军张景月及日军保护下进入济南。他一面将所有伪军统统加委为国民党中央军，一面亲自出面慰劳日军，并令日军“就地驻防，请协助加强防务”，“以待中央军接收”。^[2]鉴于此，中共山东军区根据高干会议精神^[1]部署了山东的大反攻，8月中旬到9月下旬各路大军成功切断了山东境内津浦、胶济、陇海铁路。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内战爆发，国民党军始终认为山东在国共双方的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陕北虽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地瘠民贫，难以持久。东北“共军”虽然力量强大，但地处边远，对关内局势影响不大。“只有山东军区，地当中国心脏，山东半岛深入海中，沂蒙、劳山等山脉绵亘起伏于其间，地形错综复杂，共军自称前后经营达八年，根深蒂固。加以烟台、龙口与旅大仅一水之隔，易得外

援，因此山东便成为共军最优良同时也可能守得最久的根据地。山东之得失，在国内战局中，也便有决定性作用。”^[3]对于山东的作战意义共产党方面确有同样见解。因此，1947年山东成为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主要战场。1月12日至20日国共双方进行了鲁南战役。同年9月至12月双方又在胶东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激烈战斗。

这几个阶段的战役中共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过程中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改为山东省政府，山东解放区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自胶东战役结束，中共在胶东地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把握了主动权。然根据《董必武致宋庆龄函》提到“群众损失惨重，尤以反复争夺之鲁南天宝山区、鲁中之沂蒙山区及胶济铁路两侧”“受灾严重地区鲁中、鲁南、胶东各有二十余县”可推测1948年蒋军的进攻路线更符合受灾地区的分布。

三、信中的受灾救灾情况应是指山东1947-1948年的灾荒

信中提到战役结束后，“若干年来，我军民努力生产所造成之富庶区域，现竟变成满目荒凉，加以夏淫雨成灾，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竟造成自民主政府成立以来空前未有之春荒”。这说明“蒋灾”是人祸，去年“淫雨”是天灾，天灾人祸导致了目前山东境内严重的春荒。据统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蒋灾”仅在鲁中一地，就有近万个村庄被洗劫，被抓、被杀14万人，其中10个县统计，损失牲畜8.39万头，猪羊7万余只，农具损失半数以上。鲁南边沿区白彦县几乎成为无人区，邳县林区荒地万余亩，花生地瓜扔在地里无法收获；全县荒地3万多亩，灾民3.5万人。胶东43县市，遭洗劫的37县市，遭洗劫村庄达3000余村庄，占全胶东总面积的80%。西海专区损失公粮252.9万斤，私粮1068万斤，掖县、平度两县被毁房屋达2875间，农具损失平均达55%，灾民达55万人。120万亩以上土地，因蒋灾天灾交加，人民无力耕作而荒芜，百余万人沦为灾民。^[4]这与信中提到的“据不完全统计，十五个县被杀死及抓走者十四万人，十个县损失牲口一万三千九百余头，猪羊七万余头，农具损失一半，粮食损失无法计称，民间存量搜括殆尽。目前灾情最严重者，有鲁西南之平邑、白彦、果邱、兰陵一带（费县西部及峰县邳县北地区），灾民断炊者已达十五万人……鲁中之南，麻悦庄、东里店一带（沂水莱芜临朐间）灾民数十万人，加以疫病流行，死亡甚众。胶东之昌邑、平度以南亦为广大灾区目前灾情最严重者……”等受灾情况极其相似。

“号召地方、部队及政府人员节衣缩食救灾渡[度]荒，普遍组织人民进行生产救灾渡[度]荒运动”，信中的这段内容可以总结出此时期的救灾渡荒运动是全民性质，坚持生产救灾。这很符合中共在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一贯的思路。而自从1946年秋蒋军全面进攻解放区以来，华东人民就被迫负起战争的重担。尽管华东解放军大举反攻后仅剩几个大型城

市没有收复，人民痛苦也已有所减轻，但灾象已成，入冬不久，鲁南、鲁中、胶东、苏北各地灾民计达三四百万，其中1948年一月断炊者与仅能维持至三月者便有数十万人，加以各地水患不断，灾情愈加严重。因此倘若1948年的春荒不能战胜，秋荒与冬荒亦难以克服，这势必造成山东演成常年灾荒。在这种情势之下1948年1月1日山东省政府首先颁布了《关于生产节约渡春荒的十项要求》。3月8日中共华东中央区发布了《关于春耕生产和救灾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不荒掉一亩地”的口号，对救灾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和要求。救灾的方针是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以群众自救、社会互济为主，辅之以公家协助；强调用恢复和发展生产来克服灾荒，纠正单纯救济与只向公家要救济的观点。这段关于山东灾荒救济措施的叙述甚是符合信中所提及的救灾举措。

而如果春荒指的是1946年，那么“去夏淫雨”则意旨1945年的夏季多雨水。然1945年6月21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紧急救援起来救旱、备荒、反抢粮》的社论。社论指出：山东形势日趋紧张，华北各地普遍干旱，敌人将大肆抢粮。^[5]同时《山东解放区史稿（解放战争卷）》也曾记载：在中共华东局的领导下，山东人民克服日军侵华8年造成的苦难，于1946年获得了大丰收。^[3]很明显这与信中所提的灾荒境况不符。而《山东解放区史稿（解放战争卷）》也曾提到“蒋军的进攻使人民失去对天灾的抵抗能力，人们无暇疏浚河道，培修堤坝，致使水政废弛，岸堤缺损，水道淤塞，加之1947年夏季阴雨连绵，黄、淮、胶、沽诸河普遍决口，水灾遍布各战略区。”^[4]由此可见信中的“淫雨”更符合1947年的多雨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及鲁青分署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山东分会合作，对山东解放区进行善后救济。尽管这场在内战背景下的善后救济一波三折，但其仍旧对战后山东地区经济的恢复有所帮助。因此相比较1947—1948年山东境内的灾荒，1946年4月12日正处于重庆谈判结束，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期，山东境内相对稳定之时，这一时期的生产救济远不会造成信中所提到的“空前未有之春荒”。

四、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英文档案确认信件发出时间是1948年4月12日

上海市档案馆所存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档案资料显示，《董必武致宋庆龄函》有中、英文两份版本，在中文版的时间上确实没有明确年份，但是在英文版的表头却明显刊印着英文“April 12, 1948”字样。而馆藏的目录也显示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版的时间都为1948年4月12日。由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由多国成员组成，因此会内文件通常以英文为主要通信语言，这也为向国际友人招募救灾物资提供方便。所以这份英文版《董必武致宋庆龄函》可信用度极高。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前身为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是在国际的联总、国民党的行总之外由共产党根据七大会议精神“医治战争创伤，扩大争取外援”成立的救济组织，董必武为委员会主任。该组织对战后调查统计解放区军民在抗战中生命财产的损失、破坏、以及所需援助等情况做了充分的工作，并为协助各解放区政府对受灾人民开展救济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但1946年7月，中共决定在上海设立“解总”上海办事处，并由已在沪工作的解救秘书长、上海工委委员伍云甫担任办事处处长。办事处设于上海为解总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交流通信提供了诸多便利。同年8月13日，“解救”改称中国

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所以根据解总更名历程与档案资料表头“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可判断，该封信件绝不是1946年4月12日所写，而应当是1946年8月13日之后的某一天。那么根据上文对于1946年与1948年可能性的分析，笔者得出结论《董必武致宋庆龄函》应当写于1948年4月12日。

五、结语

随着中国福利基金会资助事业的迅速开展，到1948年，在中国的8个解放区中，有8所国际和平医院，42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共有11800张床位，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6所白求恩医科大学。^[6]然而内战全面爆发后运送医药供应品到解放区的工作实际上已无法继续进行，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上海本市。^[1]因此目前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档案资料已经很难查到在董必武这封求救信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否有运送相关物资到山东。但自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尤其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以来，山东解放区始终受到基金会的长期关注与救助。基金会派遣到山东的医护人员，不仅有助于缓解山东地区的医疗问题，同时也为基金会了解国际和平医院、儿童工作以及青年工作等方面情况做出如实判断，这将更有利于基金会为山东解放区对外募捐。[]除此之外，基金会在联总、行总与解总之间担任了十分重要的物资协调角色，这为解放区物资的安全、准确送达提供了一定保障。例如在1946年9月10日基金会的王安娜在给青岛联总代表李而达的信中这样写道：非常感谢您9月2日的来信，告知我方由于环境或者道路的问题致使60箱救济药品未到达临沂。我们非常希望能有一辆卡车将药品安全送达。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2箱医书被送到烟台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这些书应该被送到临沂，当然这也不太可能，它们应该会被送到烟台的医院。无论如何，如果你能要求最终收货人寄给我们一式两份的收据我们将不胜感激。最近我们将会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254箱冬衣以及9包医药用品到临沂国际和平医院，这似乎是一种更好更简单的运输方式，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运输消息……^[7]得以想见，在内战状态下，联总、行总运往解放区的药品物资之路可谓是困难重重且有所偏颇，但中国福利基金会始终秉承初创时的原则“把援助的物品和资金投向最需要的地方，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分发这些钱物所通过的一切渠道都是公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在宋庆龄先生逝世40周年来临之际，诚以此文缅怀我们的亲密战友、同志和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参考文献

- [1] 尚明轩. 宋庆龄年谱长编（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5-496, 779, 731.
- [2] 岳海鹰，唐致卿. 山东解放区史稿（抗日战争卷）[M].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284-285.
- [3] 《中报》1947年1月8日.
- [4] 唐致卿，岳海鹰. 山东解放区史稿（解放战争卷）[M].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160, 159, 161.
- [5] 辛玮. 山东解放区大事记[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217.
- [6] 中国福利会编. 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4.
- [7] 上海市馆藏档案 U143-1-77关于国际和平医院、山东地区情况报告.

作者简介：

纪亚楠（1996年9月），女，汉族，山东青岛人，硕士，党支部书记。主要从事党史、近现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